

外出务工对农业发展影响的调查与思考

董佳智, 贾志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杨凌 712100)

摘要 农民外出务工这种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推进而出现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近年来倍受瞩目。对陕西 G 村进行了实地调查, 得出目前和未来的农村劳动力状况令人堪忧, 传统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容乐观的结论, 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关键词 外出务工; 土地; 农村劳动力; 农事管理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9)26-12736-03

Village Survey on the Effect of Out-migrating for Work o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DONG Jia-zhi et al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es accelerating,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are getting much attention as an economic and social phenomenon. Investigating G village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conclusion was obtained that current and future situation about rural labors makes people worried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planting also can not be optimistic. Finally, some countermeasure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Out-migrating for work; Land; Rural labor; Agriculture management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农业的作用就是生产食品和工业原料,因而仅着眼于以各种技术和手段实现农业的经济功能。事实上,对于农村社会及整个国家来说,农业还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1]。而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传统农区粮食生产“副业化”的问题以及种粮人群“弱质化”的难题,一直被人们所密切关注。

如今的农村,伴随着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人口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逐渐影响到整个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迁。农业的“内卷化”(社会占农民劳动成果的增长速度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农村发展缓慢或相对停止的这种状况)问题严重。究竟外出务工对输出地农村的经济发展在哪些方面产生的影响比较大,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笔者于 2008 年 4~6 月对陕西省渭南 G 村进行了村级实地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从输出地的土地、劳动力及农事管理 3 个方面探讨了农民外出务工对当地农业发展的影响。诚然, G 村的变迁经历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作为一个典型社会事实,人们可以从中发现和理解这一事实的形成过程、特点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1]。

1 G 村概况

陕西东部 G 村,是渭北旱塬北端末境的合阳县西北部的首镇,地处县城西北部 12 km 处的梁山脚下。《诗经》记载“奕奕梁山,唯禹甸之”。据考证,梁山曾是新石器、仰韶等时期先人集居之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千年古风孕育和滋润着这块古老的黄土地^[2]。

G 村属于典型的旱作农业区,海拔为 800~1 300 m,有耕地 343.33 hm²,98% 为旱地,人均耕地面积 0.19 hm²,年平均温度 10.5℃,雨热条件为一季有余,两季不足。地下水埋深 100~180 m,缺乏灌溉条件,土壤瘠薄。种植的农作物为春玉米和冬小麦,种植的苹果占总耕种面积的 34.7%。经营的副业有香菇种植、奶牛养殖等。目前,95% 的农户没有粮食商品化的意愿,除留够种植粮食作物保障自家口粮的土地外,其余土地主要种植经济作物。

建国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G 村外出务工者非常少,且多以生产队集体形式进行外出劳务活动。20 世纪 80 年代后,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由于当地几乎没有乡镇工业,使得当地劳动力的转移基本成为“离土又离乡”一种转移方式。据 2007 年统计数据显示, G 村人口 1 840 人,共计 530 户,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的 62.5%,其中 328 人为外出务工人员,占总人口的 28.9%,而超过劳动年龄的务农人员高达 148 人。

改革开放前 G 村长期处于相同模式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当地人们思想、心态、活动相当稳定。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使农村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迁,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已不复存在,社会价值取向及市场化观念的不断熏陶及体验使其社会行为较改革开放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那些离开土地外出务工获取较高经济收益的先行者们成为村民们的榜样,纷纷效仿,不断加入了外出务工的队伍。

2 外出务工对 G 村农业发展的影响

2.1 耕地眷恋度下降 耕地资源的瓶颈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我国农业的基本要素。目前,我国的耕地面积只有 1.218 亿 hm²,人均不足 0.093 hm²。仅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 40%。但是,根据陕西省农调总队对 6 277 个外出人员关于务工收入使用意向的调查,87.2% 的外出务工者把外出务工的收入用于盖房、结婚等^[2]。而 G 村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公共设施建设建设和宅基地的激增,人均住房面积已从 1949 年的 17.2 m² 增长至 1990 年 23.6 m²,到 2007 年已比建国初期增加 2 倍,达到 36.25 m²。近 17 年来, G 村仅用于住宅的耕地就有 27 049 m²^[3]。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 2 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不能形成规模。而现有按等级的土地分配制度使得大片的土地被分成许多小块,一家的土地往往分散在各地,致使机械化作业的成本提高,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从而无力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自我国 1994 年出台土地调整政策以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一直在农村贯彻执行,而伴随人

作者简介 董佳智(1983-),女,安徽亳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通讯作者, E-mail: zhikuan@tom.com。

收稿日期 2009-05-11

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这种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与日俱增。据调查,G村不同类型的农户就调整土地的意愿分别为:外出打工者较多的农户赞成的为28.5%,反对的为17.3%,无所谓的为54.2%;对农地投入较多的农户赞成的为37.8%,反对的为45.3%,无所谓的为16.9%。无论是持反对抑或赞成意见都显示了农户对土地的关注,而“无所谓”的态度则是说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在下降,这和以往村民对土地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2.2 劳动力状况堪忧 外出劳工作为减少农村人口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快速手段,必然会受到当地政府的特别鼓励,因为这种手段不需要任何投资。2007年,G村所在的镇外出务工有5179人,占全镇劳动力总人数的33%,其中有组织输出121人,到11月全镇劳务创收达4400多万元,占全镇GDP1.2亿元的29%。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使得地方领导决定,“把我们的人送出去,让他们在外挣钱,然后利用这些钱推动自己的发展,鼓励发展好的人回来创业,为家乡剩余劳力的本地就业提供门路”。在领导的号召下,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脱离农业生产进城务工经商,致使留在农村的从业人员形成了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的人口结构在G村80%的粮食生产是由老人和妇女完成的。这导致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十分匮乏,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阻碍了我国农业向商品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的进程。

在G村,目前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48.2岁,文化程度仅为小学。超过劳动年龄(男女均大于60周岁)的务农人员有148人,接近劳动人口总数的18.3%。这些本该退出农业生产的老人被迫继续承担繁重的劳动。在农村的三大留守群体中,妇女肩上的任务最为沉重,她们不仅代替传统男性劳动力所承担的繁重农业生产劳动,而且还要养老抚小。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妇女增加的田间劳动不会或很少变成现金收入,她们创造的价值被维持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掩盖和埋没,从而与外出挣钱的丈夫创造的显性收益形成巨大反差。妇女在家庭的地位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仍然低下。另外在G村,自家没有果园的妇女都在其他人家的果园里兼职一些零散活,以赚取现金收入,如季节性的苹果套袋和采摘等。

在G村,有32.47%的“留守儿童”被托付给了爷爷奶奶,22.12%的“留守儿童”托付给了外公外婆或其他亲戚等。与这些“留守儿童”居住在一起的父辈、祖辈或亲戚等有13.41%是文盲,30.12%仅有小学文化,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仅有6.12%。他们中有的没有能力(如文盲)去管教这些孩子,有的即使有能力也因隔代、隔亲而不便于管教。因而出现对孩子重养轻教,子女教育失调的现象。现如今大学毕业后国家不包分配,致使“上学不如打工”的思想更为突出,而且潜移默化地把这种思想传给了孩子。不少在校学生逐渐产生“升学不能发财,打工才能致富”的错误观念。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一些学生,特别是那些成绩较差的学生不再用心读书,只盼早日毕业,有的甚至中途辍学,流入外出务工的大军中。农村青壮年也普遍滋生“厌农”甚至“弃农”思想,尤其是新生代民工(主要指不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

生)尤为突出。G村的初中生上镇中心学校的升高中率仅为19%,多数孩子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选择进城打工。他们之中以学习技术的居多,有的学习美容美发、有的学习照相摄影,有的学习汽车修理和厨师烹饪,其目的都是为了学到一定的技术而不再务农。这种厌农思想对发展现代农业是一种潜在的人力资源危机。“年青的不愿种了,年老的种不动了”,这已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

2.3 农事管理不尽心,新技术推广受阻 农业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和劳动力来维护。大量劳动力外出,使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受到影响,且无人管护。外出务工收入主要是用于补足自己的生活、生产,公共工程缺乏资金。由于农业生产受气候、技术、管理及生产成本的影响,使得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收入不稳定,尤其是粮食生产,受到的影响更大。G村基础设施薄弱,水利条件差。村里的3个水库白家沙水库,五八水库和龙泉水库都是20世纪60~70年代建立的。年久失修都已停用,距离最近的东雷抽黄工程的受益范围达不到G村。仅有的可灌溉机井均由私人承包。按1.2元/m³水计算,每公顷1次灌溉600m³水,即每公顷1次灌溉就需要投入720元。调查显示78.2%的农民不愿意在粮食生产上追加这笔额外的投入,因此,G村可灌溉的粮田都变成了旱地。

G村每公顷土地每年的投资需种子300元,化肥1800元,农药150元,机耕费1725元,收割机使用费450元,共4425元左右;每公顷地可产小麦3750kg,按1.6元/kg的市场价,小麦每公顷年收入6000元,除去投资成本,收益仅为1575元左右(不含人工费)。种植玉米的产量为7500kg/hm²,市场价1.4元/kg,收益约在6000元左右(不含人工费)。如此低的比较利益,加之劳力缺乏,导致农民都不重视各生产环节的管理,粗放经营不可避免,进而降低了种植业的收入。有关调查表明,这种作为“副业”的农业,土地的产出仅为平均土地产出的60%~70%左右。目前G村的粮食播种面积为119.13hm²,占总耕地面积的34.7%。多数农户只种口粮用于自己消费。在经济作物上,G村每公顷苹果园毛收入从45000到150000元不等,这12500元的差距主要在于是否进行精细化的管理。

目前在我国许多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几乎全是老人和妇女,但他们认知和接受新技术的能力有限。留守的主要劳动力在接受新技术的条件调查中,做如下排序:承担风险小(49%)>劳动力投入少(36%)>经济收益高(12%)>资金投入少(3%)。这说明了目前新技术推广的主要阻力为农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留守劳动力状况。在有余钱投入其他副产业的情况下,留守劳动力对新技术、新成果、新信息反应迟钝,甚至对新技术抱有怀疑和顾虑心理,使得新技术在农村得不到推广,即使他们能接受新技术,也缺乏消化和吸收能力,不能使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目前,我国科技进步在粮食增产中的作用仅占30%左右,而发达国家却达到70%~80%。虽然我国每年取得6000项左右的农业技术成果,但转化率只有30%~40%,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与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已达80%~85%的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甚大^[4]。农村劳动力的减少是影响科技推广的一个主

要因素。G村在1998年由香菇栽培研究所推广香菇栽培,覆盖率几乎达到了60%,然而近几年在香菇效益不减的情况下,种植香菇的农户却减少到11%,究其原因,主要是因香菇的生产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拿农户的原话讲就是“没有劳力,只能啥也不种”。近几年烤烟和奶牛养殖技术的推广也因同样的理由未能得到成功推广。

3 结论

3.1 传统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容乐观 调查表明,农业生产获利较少,而且变成一种没有吸引力甚至无奈的经济活动,农户对生产投入存在最低化倾向,机械化在带来便利的同时,粗放式经营农业的现象较为普遍,农业技术推广的难度较以往增加,基础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变得力不从心。土地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3.2 未来农村劳动力状况令人堪忧 对G村的调查发现,农村的一流优秀青年,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一去不复返;二流青年多数外出务工,宁做“流浪汉”也不愿意种地;而三流青年厌农思想较浓,对接受农业技术知识缺乏兴趣。只有那些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及妇女勉强支撑起农村和农业这片天。未来谁来种地、谁愿意种地、谁能种好地将成为农村社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这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个致命打击。

3.3 传统价值观念在动摇 对于今日的农民来说,“乡”和“土”已经不再或至少不再具有原来那样带有根本性的文化意义。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得中青年农民的视野不断开阔,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已经大大减弱,乡土意识淡化,传统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市场诱惑和利益驱动下,村民关系及行为基本建立在个体权益之上,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以往浓郁的淳朴民风渐渐消失,得失计较、邻里纠纷情况不断涌现。同时,在人口高度流

动背后潜藏着社会角色认同的错位和迷失,即身份是农民但不种地,工作在工厂企业又不享受正式职工待遇。

4 对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减轻外出务工对农业的负面影响,使农业走出反复陷入困境的恶性循环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要加强农业的“托管”机制。随着人口和土地的不断变化,把农业有限的资源土地与管理和技术进行整合是当务之急。采取农民及政府参与土地资源流转的方式,把闲置甚至浪费的土地资源集中到有技术、懂管理的大户能人手中,以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第二,仅靠国家的政府投入以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输血机制远远不够。还应将外出务工的非农收入运作在整个农村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盖“一栋栋小楼房”。公共基金的融资机制必须要有创新。第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根本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群体力量微弱。他们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组织程度无法影响社会利益在分配时的倾斜。增强农民的中间组织力量和集体谈判能力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不可逾越的关口。

总之,农业的根本出路不仅在于强化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而是要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作为“人”的终极关怀,不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我国的农业就永远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朱启臻,陈倩玉. 农业特性的社会学思考[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 68-75.
- [2] 合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合阳县志[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209-210.
- [3] 黄平,E·克莱尔. 对农业的促进或冲击: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村级研究[J]. 社会学研究,1998(3):71-82.
- [4] 官希魁.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深层再思考[J]. 调研世界,2008(11):6-7.

(上接第12728页)

源流向的正确判断。不能因为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下就说农村比较利益低是不正确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并不能代表其他资源比较生产率的高低,同样,它也不能说明整个农村比较利益的高低问题。从农村资本的比较生产率看,它远远高于城市资本。因此,比较利益低并不能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理由。

3.2 农村资金外流的原因是农村投资(特别是农业)的风险高于城市 根据利润和风险是影响资金流动的一般原因这一基本理论,笔者认为在市场因素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导致农村资金外流的原因在于农村投资(特别是农业)的风险相对于城市较高。在农村,不仅农业生产面临着严重的自然风险(这是其他产业不会遇到的),其他产业所面临的风险也较城市更为严重,如政策风险、体制风险、技术风险、信息风险、信用风险等。风险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农村投资可能获得的高收益,导致农村不仅不能吸引外部资金流入,反而还会把农村地区原本稀缺的资金吸走。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政策,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长期向工业、城市倾斜,农村资源大量流向城市也就成为理所当然

的事情,结果是农村投资环境严重落后于城市,从而形成资金流出——投资环境恶化——资金流出的恶性循环。

虽然从理论上分析,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应该实现工业、城市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引导资源流向农村,但实际上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却并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的。因此,要想改善农村资金外流的状况,提高城乡资金流动效率,就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降低和化解在农村投资的风险,但同时更主要的是要从制度、体制、政策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参考文献

- [1] 翟照艳,王家传. 农村资金短缺:体制性与非体制性成因剖析[J]. 山东经济,2004(7):103-105.
- [2] 杨军,杨林娟. 关于农业比较利益的思考[J]. 甘肃理论学刊,1994(6):36-38.
- [3] 刘建平. 农业比较利益偏低:作用分析及其客观评价[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4(1):82-86.
- [4] 常婕.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提高农业比较利益[J]. 农业经济,2007(5):24-25.
- [5] 李小健. 解决农业比较利益偏低问题的现实选择[J]. 陕西农业科学,1998(2):32-33.
- [6] 刘建平. 农业比较利益论[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16-22.